

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

任剑涛 主编

Analytic Narratives

分析性叙述

[美] 罗伯特·H·贝斯 等 著

Robert H. Bates

熊美娟 李 颖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033
5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

任剑涛 主编

Analytic Narratives

分析性叙述

[美] 罗伯特·H·贝斯 等 著
Robert H. Bates

熊美娟 李 颖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分析性叙述/[美] 贝斯等著;熊美娟,李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任剑涛主编)

ISBN 978-7-300-09357-4

I. 分…

II. ①贝…②熊…③李…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西方国家②经济制度-研究-西方国家

IV. D521 F1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3054 号

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

分析性叙述

[美] 罗伯特·H·贝斯 等著

熊美娟 李 颖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9.5 插页 1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3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与政治生活的演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向纵深推进——改革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各种社会要素相互匹配的综合体制改革。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如何营造一个经济与社会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条件，保证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处推进，客观上需要人们思考，在经济之外的范围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这个时候，社会政治的思考，与社会的现代发展问题就紧紧地结合起来。现代政治学的理论需求也就随之产生。

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急需政治学理论给予理论支持。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地聚集政治学的理论资源，认真严肃地思考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同时，要求我们将眼界放宽，“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毛泽东语），尽力

翻译出版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前沿著作，使我们的政治学思考与最新的理论发展相贯通。

我们之所以一方面要强烈关注自己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要努力引介现代西方最前沿的政治学理论，是因为西方政治学界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体验最为贴近和最为深刻，他们对现代政治学的理论推进，已与现代政治生活的演变直接关联在一起。要了解现代政治生活的状态，以及想了解现代政治学理论的最新进展的人们，不能不将自己的视野投向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现代”的体验，我们处于初级的阶段。而西方人的体验则比我们长久和深刻。这是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先发性特点所决定的。他们在现代化的体验中，对于现代化提出的诸政治问题的解答，对于现代政治行动方案的设计，对于不同价值立场的政治学言说的评论、建构、解构与重构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西方的古典政治学理论发展源远流长。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也颇为壮观。承接这种理论传统，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演变，既非常复杂，又线索明晰。撇开价值立场不说，现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沿循几个线索展示自己的理论内涵：在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上，政治学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诸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问题，继续进行着富有理论力度的阐释。在说明政治生活的现实问题的角度方面，政治学拓展了研究视野，将统治的传统主题逐渐转变为治理的主题，并使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区域治理、组织治理等具体的问题凸显在政治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在比较的视角方面，政治学研究以更为宽阔的视界，从类型的比较、历史的比较、现实的比较等不同的理论角度，对于我们理解复杂的现实政治世界提供了多角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的新探求方面，现当代西方政治学结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开辟了政治学研究的崭新方法路径。这些方面的成果，我们确实有必要加以筛选、甄别，以我们的政治学理论需要，加以吸收、借鉴、转化、提升，从而建构我们“中国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

中国有悠久的政治学理论发展历史。从百家争鸣到晚清启蒙思潮，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密切互动，促成了中国政治学理

论的历史发展。到了近代，政治学与政治生活就原来的关系结构而言脱离了，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与实际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复杂的关联。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由于中西古今因素更加复杂的交汇，政治理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正是在这种处境中，我们期待通过西方政治学前沿理论的引进、消化，中国传统政治理论遗产的整理、转化，将政治学理论切入中国政治生活，增强政治学理论服务于现代化政治进程的需要，从而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本丛书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985”二期“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家创新基地资助项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组织翻译。这套译丛由马骏、何高潮两位教授具体主持。他们两位都是留美博士，对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最新发展相当了解，能够直接选取一些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有益的西方政治理论前沿著作，推介到汉语读书界。这对于建构汉语现代政治学、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方案，都是大有裨益的。丛书的推出，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全力支持，特致谢忱。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任剑涛

致道格拉斯·诺斯

——导师及朋友

在自然科学基金会（批准号 SES9022192）的资助下，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这个项目使我们能够在 1993—1994 学年一起工作。早上，我们每个人都研究他或她自己的项目；下午，我们碰头，寻找对三个领域（经济学、经济历史和政治学）交集的确认和说明。我们的讨论越来越集中于政治经济、制度和博弈论的使用。这本书就是讨论的结果。

讨论是一个中性词。探讨、争辩和辩论：使用这些词更符合实际情况。确实，到了年尾，我们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我们继续碰头，又“讨论”了两年多，对文集的草稿改了又改。大卫·费瑟曼（David Featherman）使用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总统基金来支付这些会议费用的一部分。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我们各自的系所以及哈佛国际发展

研究所我们也得到了资助。

我们一旦感到有了共识，就试图将其他人引入我们的辩论。美国政治学会 1996 年年会的一个研讨小组提供了这个平台。哈佛大学威则禾国际事务中心（the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Harvard University）资助的一个研讨小组也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在我们对这个研讨小组的邀请信中，我们倡议“良友出诤言”（good friends can be good critics）。我们很好的朋友包括 John Aldrich、Charles Cameron、Gary Cox、Jorge Domínguez、James Fearon、Jeff Frieden、Peter Hall、Ira Katznelson、Gary King、Edgar Kiser、David Laitin、Mark Lichbach、Ian Lustick、Lisa Martin、Ronald Rogowski、Fritz Scharpf、Kenneth Shepsle、Theda Skocpol、Steven Solnick 和 Margaret Somers。Alison Alter、Smita Singh 和 Jeremy Weinstein 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协助；David Collier、Mihir Desai、Geoffrey Garrett、Roberta Gatti 和 Leonard Wantchekon 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

除了要表达我们对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 Philip Converse 和 Robert Scott 的谢意，我们也要谢谢那些支持我们的工作人员和 94 级的其他同学。我们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威则禾国际事务中心的 Jorge Domínguez，他对研讨小组的资助，对这个项目的进展贡献很大。罗伯特、玛格丽特和让-劳伦希望感谢威加斯特和格雷夫的家庭，尤其是 Esti 和 Susy，他们很欢迎我们来到斯坦福，Margaret Bates、Bob Kaplan 和 Paula Scott 则帮助我们对帕罗奥多市（Palo Alto）进行了多次不定期的访问。

导 论	1
第 1 章 自我强制的政治体系和经济增长： 中世纪晚期的热那亚	27
阿芙纳·格雷夫	
第 2 章 专制主义政治经济再研究	70
让-劳伦·罗斯萨尔	
第 3 章 征兵：公民的价格	122
玛格丽特·莱维	
第 4 章 政治稳定性和美国内战：制度、 承诺与美国民主	165
白利·R·威加斯特	
第 5 章 国际咖啡组织：一个国际制度	219
罗伯特·H·贝斯	
结 论	262
附 录	272
索 引	276

这本文集强调了实质和方法的问题。各章集中于制度研讨，探讨了国际和国内政治秩序的来源、冲突的起源，以及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的互动。文中也提出了方法论的问题，尤其关注政治经济研究中博弈论的使用问题。最后，文中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分析性叙述”。

我们提出的议题，具有实质性和方法性，并且是跨学科的。发展学的学者和经济历史的学者一起寻找发展的政治基础（World Bank 1997）。制度研究越来越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工业组织学者所关注的议题（Hall and Taylor 1996）。而博弈论的使用已经从经济学扩展到政治学，甚至也进入了人类学的视野。本文集各章因此也涉及多个学科，并且面向广泛的读者。

本文集中的案例研究主要是来自对特定事件和结果解释的兴趣。对那些对特定事件进行深入

分析的学者来说，文中各章都力图说明系统使用理论的好处。对那些从事发展学和使用理论的学者来说，我们力图说明与案例材料密切对话而得到的结果。“分析性叙述”这个术语得到了我们的信任，因为理论联系数据比单独数据或理论本身更加有力。

当我们谈到理论时，我们指的是理性选择理论，并且大多是指博弈论。然而我们认为也可以应用其他形式的理论。许多模型能够用于做分析性叙述的基础：如来源于新制度主义（Hall and Taylor 1996）或分析性马克思主义的模型（Przeworski 1985；Roemer 1986）。本文集五位作者中四位是研究博弈论推理的，因为我们关注制度以及制度对集体生活权利来源的理解，所以我们将集中分析这个类型的优点和缺陷。

实质性主题

政治秩序

当代发生的事件提醒我们政治团体的稳定性不能是推测出来的，而一定是要实际发生的。本文集各章因此回到社会科学的经典主题之一：政治秩序的来源。

4 格雷夫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和人类学家，如古拉克曼 [Gluckman (1965)]、贝利 [Bailey (1969)] 及克尔森 [Colson (1974)]，一起探索来自家庭体制的政体建立的情况。格雷夫揭示出，在 12 世纪的热那亚，与当代非洲、考科萨斯 (the Caucasus) 和南亚一样，有权力的宗族竞争财富，并寻求使用公共权力来提升他们自己的私人财富。格雷夫探讨其中执政官 (the podestà) 在宗族中保持和平的方式。他检视了热那亚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探索它怎样延展自身的政治影响和在整个地中海的商业霸权。

热那亚是一个靠海的城市国家，而美国是一个大陆联邦。当热那亚力图垄断地中海的市场时，美国也在力图合并北美洲的地区。正当热那亚成功时，美国也一样，创建了地球上最大

的统一市场。白利·威加斯特（Barry Weingast）在论述 19 世纪美国政治时，深入探讨了以前卡尔·道奇（Karl Deutsch 1957）和威廉·莱克（William Riker 1964）很关注的一个问题：联邦系统的创建。莱克强调了集体获益的重要性，例如土地的占有在激励联邦系统的创建时所起的作用；道奇强调了信念的作用，指出权力中心只有在确信他们的伙伴是和平意图时才能够联合起来。威加斯特利用自己对美国的研究来深入对联邦主义的制度研究。在探索著名的平衡原则和使用一系列的策略推理时，他说明了平衡原则如何促进政治稳定和取得土地扩张的成就。^[1]正当执政官通过提高热那亚内部危险宗族的安全来保持和平时，平衡原则通过保护地区利益集团的安全来防止内战。

在国际关系层面，贝斯（Bates）也指出秩序的来源。贝斯与区域理论家（Krasner 1982；Keohane 1984）一起探讨了主权国家在全球建立联盟的方式。在集中探讨咖啡的国际市场问题时，他分析了国际咖啡组织（ICO）——一个管制全球咖啡贸易的政治机构——的来源、运作和影响。贝斯认为，国际咖啡组织通过管理市场限制了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因此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利益：更高的咖啡价格和咖啡生产商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收入的再分配（也见 Bates 1997）。

5 在探讨以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来源、联邦主义的基础和国际政权的来源时，这些文章都深入探讨了其他人论述的主题。对我们的研究进行区分的是对制度这个中心的考虑——例如，执政官、平衡原则、国际咖啡组织——以及我们分析的方法。我们与那些将制度放在政治秩序分析的核心学者——如亨廷顿（1968）——一样，然而，我们在对制度的理解上和许多学者又不同。这些章节论述了制度并不强加限制，它们提供的秩序是内生的。制度依赖于可信承诺，或是奖励的或是惩罚的。因此，它们能够也应该作为展开形式的博弈均衡来加以分析——我们一会儿要谈到这个主题。

国家间关系

文集中的一些文章也论述了国际关系问题。它们尤其将重

点放在追求国际安全和国内政治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上。^[2]

贝斯写的一章集中论述了国际政治。他记录了国际咖啡市场上政治组织代替市场力量的两个时期：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另一次是冷战时期。在这两种历史背景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消费国，与生产商合作来稳定市场价格。他论述到，在全球冷战时期，经济代理人能够为国际安全的守护者提供政治服务。当国际安全的守护者不再需要经济代理人的服务，守护者将不再遵守协议；这样，它们加速了卡特尔政治制度的削弱。贝斯通过集中论述安全利益和贸易联盟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助于解释国际关系领域当代的“新现实主义者”所最直接论述的主题（Baldwin 1993；Gowa 1994）。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体制的特征是冲突，对安全的追求形成了各国的行为；大的力量是在他们各国利益推动下提供的集体利益，包括全球层面上的制度安排。文章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支持和批评意见，这样也有助于这一丰富文献资料的形成。

贝斯分析的中心是国际事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很明显，纳粹主义的威胁使安全考虑更有说服力，安全专家在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更有发言权。莱维丰富并拓展了这个主题。她在做广泛并且细致的比较时，调查了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军队力量的人力动员方式。通过征兵的比较政治研究，莱维强调，战争加速国内政治的变迁。

6 让-劳伦·罗斯萨尔也探讨了战争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罗斯萨尔强调了专制主义的经济成本，认为对税源的寻找促使了官僚制的增长。资源也从爱冒险的国王手中流入到更热爱和平的议会手中。随着行政人员对其税基损耗的阻止，财政权的分配导致了资源分配的歪曲以及管制官僚的增长。

然而外部的威胁也不一定只有负面作用。格雷夫认为外部威胁削弱了政治统治的价值，因此使宗族间合作的限制减少，并从长远提升了私人对贸易的贡献。考虑到战争的威胁，各宗族发现政治统治变得没有价值，因此他们不太提供资源来增加军队，相反用来进行商业扩张。为了保持限制国内政治对手的需要，经济合作因而更少被限制。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国内政

治和经济组织以提升经济增长的方式加以改变。

贝斯、莱维和罗斯萨尔在各章里的论述是对国际关系领域二手资料的贡献：强调了国际竞争对国内的影响。例如，卡默荣（Cameron 1978）和卡兹斯坦（Katzenstein 1985）曾研究了由于国际市场竞争需要引起的政治改变，同时斯考朴（Skocpol 1979）和垂伯格（Trimberger 1972）集中研究了在充满敌意的政治世界里生存的需要所引起的变化。本文集的各章因此论述了彼得·古维奇（Peter Gourevitch 1978）所说的“颠倒的第二形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或是国内政治的国际决定因素。

莱维和罗斯萨尔也从国内角度探讨了国际和国家之间的互动。他们在强调国家制度结构的变化时，指出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如何导致了战争的本质和可能性的不同。他们认为，军事政策像其他政策一样，是交易过程导致的；这种交易的结果又是由政治制度的结构形成的。

在探讨国际冲突的国内根源时，莱维和罗斯萨尔的论述可以被看做对“双层博弈”文献的贡献，它强调了在国际和国内领域政治间的互动（Putnam 1988；Evans et al. 1993）。这种文献通常只对政治提供隐喻。罗斯萨尔更进一步提供了一个清楚的模型，从中得出关于政治的具体假设。在强调君主比议会对战争有更高的权力时，罗斯萨尔区分了不同的独裁政治，其中君主对战争和税收有几乎全部的控制权；议会体制下，民间的精英拥有权力；专制主义是国王和立法机关共享控制权。罗斯萨尔发现这几种体制参与战争的愿望呈递减趋势。他也发现一个“选择效用”：例如议会制下的政府很少发动战争，他们只在战争是有利可图时才发动战争，并且更愿意充足地资助战争，因而也更容易赢得他们选择支持的战争。莱维的论述更加支持了他的结论，莱维说明了不断增长的民主化和工业化对军事动员的影响。她认为，面对这两种增长，政府为了使民众确信战争的重要性必须更多地投资，以赢得他们对战争的同意。因此各章在双层博弈的文献和“民主和平”^[3]间建立了联系，并认为民主制是在选择安全政策时更有优势的机制。

政治经济

8 各章都论述了第三个主题：政治和经济的互动。最近的几十年历史见证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4]在这个复兴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众多文献中，来自经济历史和发展经济学的文章最有密切关系。由道格拉斯·诺斯（1981，1990）的著作所引起的讨论开始，经济历史学不断论述在产权得失过程中国家的角色（Rosenthal 1992）；交易成本的增加或降低（Hoffman 1988）；或资本市场的管理或管理失灵（Root 1994）。发展经济学家也集中探讨了国家的角色（Harris et al. 1991；Meier 1991），例如研究国家在促进亚洲经济增长中的角色（World Bank 1993；Fishlow et al. 1994），或是在非洲国家所扮演的阻碍增长的角色（Findlay 1991）。我们和经济历史学家、发展学家一起集中研究经济繁荣的政治基础。例如格雷夫探讨了热那亚商业扩张中政治稳定性的作用；威加斯特深入研究了美国经济扩张中联邦的支持作用。我们同样和他们一起探讨了产权的政治起源（威加斯特对奴隶制的研究，莱维对征兵的研究）、税收的政治起源（罗斯萨尔对法国的研究）、贸易政策的政治起源（贝斯对咖啡市场的研究）。集中研究国家角色的经济历史学家和发展学家们在这些研究中也发现很多乐趣。

区分我们研究的主要不是我们所论述的主题，而是我们在论述主题时所做的假设。区别各章的主要是他们分析强制方式的不同。我们并不将力量视为经济生活的外在因素；它并不是从独立的政治领域侵入的。我们也不将政治经济看做是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简单互动，或是“国家”对“市场”的侵入。相反，各章假设强制更多是生产、消费和交换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对强制的广泛存在的认定代表了对一些人的赞同，更多的是政治学家，他们批评理性选择理论“将政治从政治学中拿出来”^[5]。当然，我们的确主要探讨了选择理论和从自愿交换中所得到的收益，但是我们也探讨威胁、限制和力量的作用。我们看到了地区扩张、征服、国家建设和战争。尽管我们的研究是以理性选择理论模型为基础的，但是它并不是应用性的。

强制如何被建构和组织起来？它如何被用来支持经济增长？为了论述这些问题，各章集中探讨了政治制度的作用。

制度

我们认为，制度使得选择被管制起来，因为它们是在均衡中产生的。就均衡而言，给定选择、收益和他人选择的预期，没有哪个行为者会单独选择改变他或她的行为；也没有哪个行为者有理由改变他或她的预期。^[6]如果外部因素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期待的行为是保持不变的（见附录）。行为保持稳定和模式化，或是制度化，不是因为它是被强加的（imposed），而是因为它是被引出的（elicited）。^[7]

当然，也存在其他的制度概念。追随韦伯的社会学家集中探讨权威的模式；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强调法律惯例和强制性结构（Hall and Taylor 1996）。尽管它来自于其他人的写作，我们对它的解释则因为以微观层次的理性推导为基础而有所区别。以理性选择假设为基础，概念主要直接来自于对非市场环境下交换的理性推导。主要包括了如米尔格罗姆（Milgrom）和罗伯特（Roberts 1992）这样的博弈理论家，公司研究的学者，如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1985）；经济历史学家，如诺斯（1981，1990）。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学家的研究（Shepsle 1979；Ostrom 1990；Kiewiet and McCubbins 1991；Krehbiel 1991）和其他使用微观理性推导来研究立法、政党和其他政治制度的学者的研究。这些方法中存在着重要的区别，我们既不愿意也不期望能够总结更广泛的文献。^[8]以下的讨论和附录足够用于现在的目的了。

我们在分析制度时，使用的概念主要来自于展开形式的博弈分析。^[9]本文集的目的主要是激励这种选择。因为我们力图探讨具体、历史的案例，希望能够理解在具体环境下个人的选择。我们希望找出产生这些事件和结果的行动、决策和回应的顺序。我们研究的个人有其偏好和预期，他们并不是分离的个人，而是在互相依赖的场合中的个人。这种展开形式明确地强调了我们的案例材料的这些特征。

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展开形式的博弈，所以我们考虑的是子博弈最优术语中的均衡。在展开形式的博弈中，一个子博弈，大概说来，是博弈的一部分，在其中，行为可以被单独分析，